

粮食、习俗、卫生与十九世纪的岭南瘟疫

赖文 李永宸

广州中医药大学 邮编: 510405

(本文发表在《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》2004年第10期)

摘要: 十九世纪岭南社会、经济和人文状况在瘟疫的传入、发生和流行中起着重要作用: 与粤西及东南亚地区的频繁粮食贸易给霍乱和鼠疫的传入提供途径; 城镇发展迅速而卫生建设滞后潜伏瘟疫流行的危机; 粤人喜吃野味、吃生及归葬故里的不良习俗为瘟疫发生和传播提供机会。

关键词: 岭南 瘟疫

十九世纪, 岭南沿海地区瘟疫频仍, 造成这一状况的直接原因是霍乱、鼠疫的传入。虽然传染病流行病学研究已经明确知道, 广东霍乱的大范围流行始于 1820 年, 而且每每受世界流行所波及, 鼠疫的传入则与 1866 年到云南平叛的军队把疫源带返北海有关, 但要了解霍乱、鼠疫传入岭南的途径及长期徘徊不去的原因, 还要从当时广东的社会、经济、人文状况中考究。

一、粮食输入与瘟疫

广东在明代嘉靖以前, 粮食尚自给有余, 以致福建商人从正常渠道或通过走私, 把广东谷米运往福建。“往者海道通行, 虎门无阻, 闽中白艚、黑艚盗载谷米者, 岁以千余艘计。”(《广东新语·食语》)但到了明万历(1573-1619年)年间, 已经是“粤东人稠地窄, 米谷不敷, 仰赖广西, 兼资湘楚。”(光绪《河源县志·农功》)清乾隆以后, 广东人口增长速度超过耕地增长速度, 由原来的地广人稀变成地狭人众。这一现象在广州和潮州两府最为严重, 广州府的南海县人均耕地不足 1.5 亩, 潮州府“纵大有年不足供三月粮”。(乾隆《澄海县志·风俗一》)广东缺粮的另一重要原因, 是商贾赢利和出口贸易便利的刺激, 致使“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, 辄弃耒耜而从之”(《广东新语·食语》), 能务农尽地力者, 亦将大量土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, 以至在乾隆十三年已经被认为是“产谷无几”(《清史稿·食货志》)。由于“所出之米不敷民食为数匪少, 殊有乏食之虞”,^[1]必须依赖广西和内地的输给, 尤其是水陆运输较为方便的近邻——广西。明万历时, 广东已经“每岁仰粤西粟数十万斛”, 入清以后, 粮食贩运更是不断递增。与此同时, 明清的广西食盐非本地所产, 皆取给于粤东, 其中高、雷、廉三州是贩运的主要通道。因此, 两广之间的粮、盐交易十分兴盛。据有关研究, 仅乾隆五十三年在梧州仓梧县县城经商的广东商人就达 518 家, 主要从事贩运广西粮食回广东, 经此地交易并最终转运至广州、佛山、三水、顺德一带销售的谷米每天达 20 万-30 万斤。高州吴川县梅菪圩、廉江县安铺圩因地处粤东、西商贸海运要口, 成为珠江三角洲商人聚脚的地方, 乾隆年间, 广州商人已经在吴川县县城和梅菪圩设立会馆。广东官府“又在省城、佛山两处于额设米行之外, 添设经纪米谷总埠各一处。官为设立牙行, 遇有粤西谷船暨乡村米谷, 必须投至总埠始准发卖。”^[2]

广东每年大量从广西进口粮食, 给粤西鼠疫传入粤东制造了机会。清初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对东、西

粤的粮食交易有一段很重要的论述：“东粤少谷，恒仰资于西粤。西粤之贵县尤多谷，然其地僻在山谿，稻田亦少，其谷多半出于东粤灵山。《广州记》云：交趾有骆田，仰潮水上下，是名雄田。其禾能风旱而早实。今灵山亦交趾地也。土广而人稀，美田弥望，无分高下，皆有水泽沮洳之润。民务耕耘，尚畜牧，以牛之孳息为富。谷多不可胜食，则以大车载至横州之平佛，而贾人买之，顺乌蛮滩水而下，以输广州。”（《广东新语·食语》）

广西贵县是西江谷米贸易的集散地和输出地之一，广东廉州府的灵山（其实是灵山以南近海一带的北海地区，今属广西省）才是贵县谷米的主要来源。灵山北连郁江水道（汇入西江的干支之一）流经的横县，是北海地区与贵县之间的通道，南临合浦、防城、钦州等沿海地区，东接浦北、博白、陆川、玉林、北流。据今人调查，广西 1866-1947 年有 44 个县（市）发生了 63 年次的人间鼠疫流行，东南西北中都有发病，疫区与非疫区没有明显的区域界限，“桂东南地区的疫情明显重于桂西南地区”。^[3]分布在东南部西江粮运水道上的横县、贵县、藤县、苍梧都“榜上有名”；分布在南部两广之间水、陆、海联运线上的疫区不仅数量多、连成片，而且流行时间早，长时间反复流行（括号内为鼠疫始发年份）：灵山（1866）、合浦（1867）、钦州（1871）、北流（1871）、陆川（1888）、博白（1890）、防城（1890）。^[4]“目前学术界已基本认同：鼠疫在历史上不管是传入的还是自然进化形成的，只要它在一定的地理地带流行过一定的年代，就有形成自然疫源地的可能。”^[5]广西与雷州半岛已经被确定为西南山地闽粤沿海黄胸鼠疫源地，主要宿主、媒介为黄胸鼠和印鼠客蚤。“已感染的跳蚤在离开它们的寄主之后，还能在装载着羊毛和布料的货物箱里存活好几个星期，它们会在卸载的地方，如商店和仓库等，找到新的老鼠”，^[6]更何况谷米是老鼠之所好！北海地区是粤东谷米重要供给地；合浦及高州的遂溪、廉江、吴川等地是西粮东输的重要海运通道；吴川县城、梅菪圩等海口市镇是珠江三角洲商人云集之处；广州、佛山是粤西米谷的集散地。把这些联系起来，可以从一个方面解释高、雷二州何以紧继廉州之后在 1872-1880 年就成为广东的鼠疫传入地和流行重灾区，也可以部分解释广州、东莞等珠江口地区何以会早在 1879-1880 年便跨越珠江口以西的阳江、台山、新会等地而有鼠疫流行的迹象，还能解释何以西江下游的封开、郁南、德庆、高要、肇庆、三水等地的鼠疫流行均晚于广州和佛山。当然，也就不难理解中国第一部鼠疫治疗专著《鼠疫汇编》何以会出自廉江、吴川两位民间医家吴宣崇、罗芝园之手。

为解决粮食问题，清政府还大力鼓励从暹罗（泰国）等国进口米谷。“（雍正）六年谕暹罗商船运来米谷永远免税。”“（乾隆）八年，诏暹罗商人运米来闽、粤诸省贸易，万石以上免船货税银十之五，五千石以上免十之三，其米照市价公平发糶。若民间米多，官为收买，以补常平社仓，或散给沿海标营兵粮之用。”其后，清政府正式允许民间与暹罗进行谷米贸易，乾隆十六年甚至为“奖励商人赴暹罗运米，至二千石以上者，予议叙给顶戴”（《清史稿·属国传》）。广东潮汕地区成为我国近代流行性霍乱的最早传入地之一，决非偶然。这一地区人多地少、缺粮严重，而且东南亚各国尤其是泰国的大米贸易主要由潮州商人把持。据有关统计，明清 62 家潮州商人中就有 19 家经营泰国大米业务。^[7]在中国海港检疫制度尚未建立的历史条件下，一旦东南亚各国出现流行性霍乱，与之有频繁贸易往来的口岸，就极易被感染。光绪《海阳县志·杂

录》有一则耐人寻味的记述：“嘉庆庚辰（1820年）6、7月间，各处有瘟疫传染之症。先曰：2、3月时，有老人贴药方于街路牌坊间，谓可治疫，大约用贯众、苍术、大黄等物。其近海滨一带最剧，其症之初起，云自暹罗海船来。据此，则先之言多不可忽。”一般认为，1820年夏秋汕头地区多个县的瘟疫流行是霍乱首次侵入引起的。《海阳县志》透露了一个信息：霍乱可能是随泰国商船传入汕头，而此前，泰国已经在流行霍乱，当地也似乎有人熟悉这种病。

二、不良习俗与瘟疫

粤人有喜吃野味的习俗，其中之一，就是乌豆煮老鼠，认为这样可以补阴而旺发。现代研究认为，鼠疫杆菌可以经体表伤口、呼吸道、口、眼结膜等感染人类。在通常情况下，鼠间鼠疫的流行使大批老鼠死亡，其身上寄生的跳蚤会成批地离开死亡的宿主去寻找新的宿主，其中通过叮咬人类而引发人间鼠疫流行。“据某些科研工作者的报告，当啮齿类动物被人抓住或被鼠夹打住的时候，蚤类也会离散，这一点可能对人的散发病例有一定作用。”“经口感染看来对于习惯吃各种自然宿主动物的人很重要。伴发肺炎的扁桃体鼠疫，曾在南美和越南见过，那里的居民有用牙咬碎外寄生虫的癖好。”^[8]岭南鼠疫流行地区“有鼠将死而猫噬之，猫死，人食其猫，人死；高州人外瘞鼠处，牛齧其草，牛死，犬亦如是”（《鼠疫抉微》），大概就是这个原因。因此，人类在宰食感染鼠疫的病鼠时，完全有可能染上鼠疫，并传播给他人。从1894年广州首次鼠疫爆发流行期间《申报》的报道看，当时广州确有人因吃了染疫之鼠而被传染：

本年疫病流行，硕鼠先受其厄。食之者被毒传染，每有因而毙命者。好善之士，特出资购买死鼠，且贴布字启，劝人莫食。然老饕之流，仍未深信。大新街横巷陈氏妇，素有是癖，家中豢一狸奴，一日间得一鼠，妇烹而食之。詎料朵颐才快，即腹痛难熬。医者咸谓伏热极深，不可救药，至夜深而歿。盖此次粤垣疫症之行，大都因云冬亢旱，地气郁而成毒，乘春洩发，鼠穴地中，先受其殃。迨来鼠之被瘟，未始不由于此。故人之食之者，亦足致命。是则贪口腹之欲者，故不可不慎也。（《申报》1894年5月19日）

粤人有吃生的习俗。岭南濒海临河，地多池塘，水产丰富。据记载，岭南土著之一的蛋家，其“妇女皆嗜生鱼，能泅汙”（《广东新语·舟语》）。“粤东善为鱼脍，有宴会，必切鱼生为敬，食必以天晓时空心为度。每飞霜罽，抱蜜醪，下姜葵，无不人人色喜，且餐且笑。”（《广东新语·食语》）《广东新语》作者屈大钧本人也乐于此道，说来津津有味：“粤俗嗜鱼生，以鲈，以鲠，以鱮白，以黄鱼，以青鱈，以雪鲈，以鮫为上。鮫又以白鮫为上。以初出水泼刺者，去其皮剑，洗其血鲑，细劔之为片，红肌白里，轻可吹起，薄如蝉翼，两两相比，沃以老醪，和以椒芷，入口冰融至甘旨矣！而鲔与嘉鱼尤美。予尝荡舟海目山下，取鲔为脍。”（《广东新语·鳞语》）很多水产品都被用作鱼生，除上述多种生于河、海、鱼塘的鱼类外，水田里长的鳊、海边养的蚝都生食，“或以鳊之乌耳者、藤者、黄者为生，亦有以蚝为生者”（《广东新语·鳞语》）。生食不仅是图味美，还被认为有滋补作用。“（雪鲈）生食之益人气力。鲈、鳊、鲔、塘虱亦可脍。然食鱼生后，须食鱼熟以适其和。身壮者宜食。谚曰：鱼生犬肉糜，扶旺不扶衰。又冬至日宜食。谚曰：冬至鱼生，夏至犬肉。予诗：鱼脍宜生酒，餐来最益人。”（《广东新语·鳞语》）即便食用其他肉类和蔬菜，也不喜过熟。由于岭南农村传统上以人体排泄物为肥料，甚至用人粪便喂鱼，病菌容易污染水塘、河涌、

近海等水域，水产品、蔬菜和家禽等最易沾染。“去年（1903）西 5 月，验悉街市之鸡、鸭、鹌鹑，均有疫症。华人食此物，不甚煮熟，疫症多由此传染。”（香港《中国日报》1904 年 4 月 19 日）岭南民间“食生”的习俗为霍乱等胃肠道传染病的传入和爆发流行造成机会。

粤人“落叶归根”的情结很深，有病死他乡、归葬故里的习俗。外出谋生的人一朝溘逝，殁后常停厝于善堂义冢，待亲属认领以归葬故土。即使远在海外，一些人也设法将尸骸骨殖运回原籍安葬，其中难免有疫死者。安铺老中医称约在 1884-1888 年，因染疫华侨尸骨运回存厝后安葬，翌年豆豉村发现鼠疫，随后传开。^[9]虽然骨殖传染鼠疫的可能性令人怀疑，但没有条件彻底清洁处理的新近尸骸及其衣物和护送人员，却有可能把传染病带入。据说，“1346 年，西征的蒙古军队包围了黑海港口城市克法（今费奥多西亚，属乌克兰），用投石机把患鼠疫死亡的死尸射入城内，城里鼠疫由此开始流行”。^[10]不幸客死他乡又无法归附祖莹的人，其遗物也总要寄回给家乡亲人。一些疫死者的衣物，由此成为传播瘟疫的凶手。“光绪三十二年，梅县城区发生鼠疫，首例病者系西街山川亭侧蓝屋人，其家人在佛山患病死亡后，家属将寄回的衣物取出摊晒而传染，同屋（村）人 3 天内罹鼠疫而死亡的 10 余人，从此蔓延各乡。”^[11]

三、城镇卫生与瘟疫

岭南古代疫情主要集中在清代，尤其是光绪、宣统年间，这种疫情分布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。晚清时期岭南人口增长迅速，迫于生计，向城镇流动的人口日益增加；水陆交通运输发展带动沿线城镇墟市的发展，进一步吸引人口向城镇集中。与此同时，在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的影响下，岭南城镇工业和手工业发展迅速，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城镇乡村人口也随之日益密集。1891 年，仅南海县大同乡一地，就“户口繁庶，聚族而居者约有数万人”（[《申报》1891 年 3 月 21 日]。南海人陈启沅于 1872 年创办的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继昌隆缫丝厂，工厂女工达六、七百人。^[12]到 1894 年，广州人口已经上百万，^[13]有纺织工场 2500 多家，密集的居民区内分布着许多纱厂、布厂、手工作坊及囤放货物和原材料的仓库，众多污浊的河涌贯串着民居、街道、厂房和仓库。1892 年以前，粤海关税务司雷乐石还说广州“这个地方并非不卫生，很少发生瘟疫，也很少流行传染病”，^[14]可 1893 年 7 月 21 日的《申报》已经在指责广州“城厢内外，人烟稠密，各街道粪草垃圾堆积如山，一至炎天，秽气薰蒸，闻之易生疠疫。”1896 年广州城区的卫生条件仍然没有得到改善，“入冬以来，雨泽过少，居民饮污浊之水，以至疠疫丛生。”（《申报》1896 年 2 月 8 日）乡镇条件更差，以下是鼠疫严重流行地区梅菉镇 1902 年的卫生状况：“壬寅光绪二十八年，夏，疫；秋月，大水。梅菉街道不事清除，秽气迫人，实为致疫之本。通判彭厚源仿广州城及高州城清除街道之法，飭局绅妥办经理，无如奉适欲举行，因逢凶岁，遂不果。”（光绪《梅菉志稿·事纪》）

占人口多数的下层民众和体力劳动者，卫生条件与生活方式尤易致疫。1896 年 8 月 17 日《申报》“续卫生说”曾有如此评说：“彼肩挑负贩之人与夫车夫船户等辈，但得卫生合度，断不致于遇疫丧身。且夫平日力作辛劳，四体时时运动，揆之于理，当较富者而筋骨充强。惟若辈昧于养身，食则饥饱不匀，睡则枕褥污秽，日以鸦片为性命，一灯相对，室小于蜗，臭汗蒸腾，不思澡衲；得资则更消耗于花烟之馆，云天雨地，耗精敝神。凡于卫生一切事宜，不特全不讲求，且事事与其相反，而欲不促其年寿，呜呼，盖亦

难矣!”对 1894 年广州鼠疫,粤海关税务司法来格亦有类似的想法:“广州最关紧要者,即系瘟疫。闻有人云,省会毙于此劫者,不下 10 万人,其间贫苦者居多,大都因其饮食不佳,房屋狭隘之故。”^[15]民国《开平县志》也注意到当地鼠疫流行时,“其民居稠密秽浊地方较为易染”。

城镇人口剧增,居住环境日益挤迫,加上卫生观念、卫生建设落后,卫生条件恶劣,这些都为瘟疫的爆发流行埋下隐患。1893 年广州举行科考,“城内士商云集,以平时人数较之,约增多三万余人。凡试寓客店皆已住满,几无容身之地。人气既盛,疠疫亦因之而生。前日仙湖街某武馆一日之内猝毙三人……药材棺木生意形忙迫,无不利市三倍。”(《申报》1893 年 9 月 25 日)晚清时期,岭南“疫病城市多,而乡居少”,(《时疫辨》)各地鼠疫,“所疫多小孩、妇女、工役人等”(光绪《梅县志稿·事纪》),显然与生活居住环境差有关。“盖乡曲之间,地方旷阔,里仅数村,村仅数户。即使偶染时疫,亦不致十分滋蔓。城市之中,地狭而人稠,烟户栉比,秽气蒸郁,疫疾易于传染。”(《申报》1894 年 5 月 25 日)城镇发展迅速而卫生建设滞后,这是清代,尤其是光绪、宣统年间岭南瘟疫特别频繁、疫情特别严重的又一重要原因。

综上所述,十九世纪岭南社会、经济、人文状况在瘟疫的传入、发生和流行中起着重要作用。有鉴于此,今天的防疫工作应该是一个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。

参考文献:

[1]法来格:《光绪二十年广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》,见潘启后《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》第 350 页,暨南大学出版社,1995 年版。

[2]黄启臣、庞新平:《明清广东商人》第 56-58,64-70,197,201 页,广东经济出版社,2001 年版。

[3]李寿生,杨光华,刘有玲,等.广西鼠疫的历史、现状及对策[J].地方病通报,1995,10(4):80-82.

[4]据地方志、洗维逊《鼠疫流行史》(广东省卫生防疫站内部资料 1989 年第 179-181 页)及李寿生、杨光华,刘有玲等《广西鼠疫的历史、现状及对策》整理。

[5]李寿生,杨光华.对广西鼠疫自然疫源地问题的分析[J].广西预防医学,1996,2(1):48-49.

[6](美)霍华德·马凯尔(Howard Michael):《瘟疫的故事》(罗尘译)第 41 页,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2003 年版

[7]见黄启臣、庞新平《明清广东商人》第 146-150 页,广东经济出版社,2001 年版。

[8][美]W. T. 休伯特, W. F. 麦卡洛克, P. R. 施努伦贝格尔主编:《人兽共患病》(中译本)第 94-95 页,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1985 年版。

[9]洗维逊:《鼠疫流行史》第 190 页,广东省卫生防疫站(内部资料),1989 年印。

[10](美)霍华德·马凯尔(Howard Michael):《瘟疫的故事》(罗尘译)第 34 页,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2003 年版。

[11]梅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:《梅县志》第 980 页,广东人民出版社,1994 年版。

[12]蒋祖缘、方志钦:《简明广东史》第 512 页,广东人民出版社,1993 年版。

[13]李玉尚认为 J. F. James 称当时广州人口为 150 万是明显夸大,根据曹树基的看法,清末广州人口

大约为 100 万人。见李玉尚《和平时期的鼠疫流行与人口死亡——以近代广东福建为例》，史学月刊，2003 年第 9 期第 85 页。

[14]雷乐石：《粤海关十年报告（一）（1882-1891 年）》，见潘启后《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》第 885-886 页，广暨南大学出版社，1995 年版。

[15]法来格：《光绪二十年广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》，见潘启后《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》第 352 页，暨南大学出版社，1995 年版。